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七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孙 宏 / 主译

(修订版)



散文作品(戏剧和小说)
1940年—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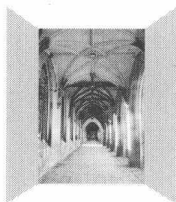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七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孙 宏 / 主译

(修订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散文作品(戏剧和小说)
1940年—1990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7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7卷(修订版) / [美]伯科维奇主编,
孙宏主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17-1042-0

I. ①剑… II. ①伯… ②孙… III. ①文学史-美国-
1940~1990 IV. ①I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037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7卷(修订版)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刘庸安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36 (编辑室)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00 千字

印 张: 58.5

版 次: 2012 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主 译 孙 宏

译校人员 (按姓氏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程 强	崔明路	姜 宁	雷 冷
李 玲	李 平	李 英	吕秀英
马惠琴	马 静	牛亚军	庞艳辉
唐冉菲	汪翠萍	王莎莎	武田田
宣 菁	杨 敏	杨晓辉	于 红
袁笠玲	曾 颀	张录侠	张 强
张秀见	张志纯	左连凯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7卷

(小说与戏剧)

1940—1990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涵盖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涉及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因此既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讲话，也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保持的连续性发言。叙述部分在书中占了很大比例，使本书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又有了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也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论述。美国文学材料的扩大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作品以前曾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材料扩大的同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都在急剧增长。《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学术和批评事业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也许是最年轻的文学传统，而中国文学则是最古老的文学之一。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 personal 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不同凡响。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



己的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总序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 - 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 5 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 30 页篇幅论述 18 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姿多彩，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主编寄语

我十分感谢哈佛大学给予这一项目的不断支持，也十分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安妮·萨诺的协助，以及伊坦·伯科维奇和苏珊·米兹卢奇的不懈支持。最后，无论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从学术上讲，我都深感荣幸地提及学术界新一代的三位学者为这一卷所撰写的文稿——这三位杰出的青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有所成，他们为我们这项共同的事业带来了过去十年间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独到的见解以及富于洞察力的观点：约翰·伯特撰写了“南方文艺复兴之后”篇章；赛勒斯·帕特尔撰写了“新兴文学”篇章；玛格丽特·里德撰写了序言第二节的大部分内容，并对本卷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概括。

为这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我要向孙宏教授表示感谢，因为他的翻译非常出色，真正将艺术和学术完善地结合在了一起，是所有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最后我要向我的儿子萨沙表达我的一点钟爱之意。他的诞生和幼年恰好与这部文学史的进展同步，他成长的岁月一直是我体验喜悦和获得力量的源泉。

萨克文·伯科维奇

小说与社会——1940 年至 1970 年

我十分感激萨克文·伯科维奇编辑的耐心鼓励和宝贵评论、约翰·贝恩、赛勒斯·R. K. 帕特尔以及温迪·斯坦纳等撰稿同事的通力合作，他们自己的出色工作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探讨那些我最感兴趣的作者。我得益于许多批评家关于战后小说的卓越见解，其中有约翰·W. 奥尔德里奇、利奥·布劳迪、罗伯特·博恩、马尔科姆·考利、切斯特·E. 艾辛格、约瑟芬·韩丁、欧文·豪、斯坦利·埃德加·海曼、彼得·G. 琼斯、弗雷德里克·卡尔、艾尔弗雷德·卡津、托马斯·希尔·绍布、马克·舍西纳、特德·索罗塔洛夫



和戈尔·维达尔；我也得益于学者们对战后美国生活进行的广泛的历史研究，其中有威廉·H. 沙弗、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戈德弗雷·霍奇森、肯尼斯·T. 杰克逊、威廉·洛伊希滕伯格、威廉·L. 奥奈尔和詹姆斯·T. 帕特森。在我所教授的战后小说课上，我也从我的研究生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其中有彼得·马舒赫和比尔·穆勒恩。洛尔·迪克斯坦一如既往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莫里斯·迪克斯坦

南方文艺复兴之后

首先我要向萨克文·伯科维奇致谢，他从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全力帮助我，vii
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在本文的阐释当中，这些谈话的踪迹随处可见。莫里斯·迪克斯坦也对我鼎力相助，使我得以理清思绪，对本项目有了一种整体感。他和萨克文·伯科维奇一样，也认真地阅读了我所撰写的篇章，并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批评和建议。罗莎娜·华伦、詹姆斯·A. 格里姆肖和威廉·贝德福德·克拉克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还就本项目和布兰戴斯大学出色的同事和学生们进行过谈话，很受启发，尤其是尤金·古德哈特、乔治·富兰克林、苏珊·斯塔弗斯、威廉·弗莱施和劳拉·昆尼。乔·安妮·普雷斯顿的批评敏锐而又很有洞察力，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使我受益匪浅。

约翰·伯特

后现代小说——1970年至1990年

一部百科全书的条目足以改变其作者一生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但是本篇关于美国当代小说的论述对我的一生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段历史的范围与我的成年时代恰好相符，因此萨克文·伯科维奇这位陌生人突如其来给我打电话安排这项重要任务，简直就是命令我学习自己的世界，这位陌生人很快就成为一位豪爽的朋友和导师，所以现在用感激这个词已无法尽述我对他的情谊。他给我的馈赠之一就是介绍我认识了我这一代人当中最有才华的美国文学研究者，他们以文学史专家的博学和自由改革者的勇气，在这几卷中重新构建了美国文学的标准。我在这里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实属荣幸。多年来，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的课上讨论后现代小说方面的观点，从学生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这些学生当中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对于他们的激励以及学校的不懈支持我都深为感谢；学校给了我假期和研究经费，使我得以



完成我的工作，尤其是英语系的理查德·费希尔主任对我十分关照。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爱玛和爱米尔，随着她们的成长，我也继承了前辈的学术传统，在事业上成长起来。我们都得互相容忍对方的种种失误和感情迸发，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母女三人当中又有谁愿意舍此而做出别的选择呢？

温迪·斯坦纳

新兴文学

viii

我对于新兴文学能动性的兴趣形成于 1991 年至 1993 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校长博士后研究员期间。对于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和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我都十分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财力、物力，使我能够开始进行在此发表的这项研究。我还要向纽约大学的研究挑战基金会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一笔暑期补助，使我能够完成我为《剑桥美国文学史》撰写的最后一稿。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朱莉·格林布莱特、T. 苏珊·张和安妮·萨诺和我一道致力于本卷以及其他各卷《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出版工作，为此我要向各位编辑致谢。他们十分重视这个项目，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本书的各位撰稿人能够冲破种种困难和疑虑，最终获得成功。

本项目的研究给予我的诸多教益之一就是，它使我明白了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我在新兴文学方面所做的论述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学者为之奠定基础，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学者就是：鲁道夫·阿库尼亚、巴里·D. 亚当、保拉·冈恩·艾伦、戴维·伯格曼、霍米·K. 巴巴、威廉·伯尔豪尔、胡安·布鲁斯-诺沃亚、约瑟夫·布鲁赫克、赫克托·卡尔德隆、陈素成（音译）、乔治·乔恩西、张敬珏、斯蒂芬·康奈尔、约翰·德埃米利奥、罗杰·但尼尔斯、玛丽·V. 迪尔伯恩、马丁·杜伯曼、托马斯·费拉里奥、菲利普·布赖恩·哈珀、马龙·K. 霍姆、弗雷德里克·霍克西、阿布杜勒·贾恩·穆罕默德、乔纳森·卡茨、金伊莲、阿诺德·克鲁帕特、保罗·劳特尔、林雪莉、肯尼恩·林肯、林英敏、戴维·劳埃德、利萨·洛、弗朗西斯·马克·蒙迪莫尔、南茜·J. 彼得森、A. 拉封·布朗·劳夫、何塞·戴维·萨尔迪瓦、凯瑟琳·斯廷普森、克劳德·J. 萨默、达纳·高木、罗纳德·高木、邦尼·杜·史密斯、安德鲁·维格特、赫莎·D. 黄、黄秀玲、罗伯特·J. 扬。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我有幸认识，另一些人虽未谋面，但通过其杰出的著作我对他们也有所了解。我尽可能将他们的



作品列入了本卷的参考书目。

我最初获得这一项目的机遇时，是伊丽莎白·福勒鼓励我担当此任的，在起步的几个关键阶段，她又帮助我，使我对该项目的构想更加完善。她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至今仍然激励着我。本篇几易其稿，不少同事和朋友慷慨地花费时间一一阅读，并提出十分宝贵的建议。他们是南希·本特利、尤纳·肖德乌里、约瑟芬·韩丁、苏珊娜·基恩、埃琳·莱马和布莱基·弗穆尔。我尤其要感谢维尔纳·索勒斯，他不仅阅读了一稿的全文，予以评论，而且邀请我出席他所开的一门本科生课程——种族问题研讨课，对我的观点加以检验。

在我对新兴美国文学部分进行探讨的每一个阶段，纽约大学的同事们都对我的兴趣予以不懈的支持；我感谢安东尼·洛、约瑟芬·韩丁和杰弗里·斯皮尔帮助我把研究生教学转向这一领域。上我的新兴当代美国文学课的学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他们热心参与，富于感染力，不断向我提出挑战，使我的观点不断发展，表达得更加清晰，论证得更加严谨。许多学生的谈话和文章都曾对本书的这部分论述产生影响，其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布里奇特·布朗、洛雷塔·米哈雷斯、杰·罗和狄安娜·特纳。

我有幸在生活的各个阶段都遇到良师，我最诚挚地感谢玛丽·伊夫林·布鲁斯、托马斯·斯考尔、格雷戈里·隆巴尔多、吉尔伯特·史密斯、唐纳德·赫尔、约翰·V. 凯莱赫、沃纳·伯索夫、利奥·马克斯和菲利普·费希尔，是他们教我认识到研究学问，其乐无穷。

我也为能有卡伯特·布朗和莫利·布朗夫妇、约瑟夫·赫申森、乔纳森和艾里特·科尔伯、安·科比特以及安得鲁·惠特尼等益友而感到荣幸。这些朋友也许相距遥远，但是在我的思想上却从来隔得不远。老朋友虽然各自走上不同的事业道路，有着不同的专业兴趣，情谊仍然长存，知道这一点实在令人振奋。

我的亲人，不管是近在身边还是相距遥远，都是激励我奋斗的源泉。我的伯母巴诺·帕特尔和已故的伯母弗雷恩尼·帕特尔以及叔父诺西尔·帕特尔都有着坚忍不拔、勇于献身、恪守信仰的美德，为我树立了榜样。我对我的伯母戴安娜·M. 帕特尔甚为感激，她除了给予我爱，还在经济上支持我，包括送我便携式电脑，本项目的初稿就是用这部电脑打成的。我对她的丈夫，我已故的伯父、与我同道的前辈学者、教授米诺契尔·K. N. 帕特尔十分怀念。我姐姐谢琳作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同行学者，在本项目进展的过程中阅读了初稿，给予我指导和鼓励；她对我的能力充满信心，使我在犹疑之时能保持坚强。我的父母鲁西和埃斯特雷利亚·帕特尔使我从小就深知教育的重要



性，为了使我接受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波涛汹涌之时，他们是我安全的港湾。我的妻子德博拉·L. 威廉斯每天都激励着我，发挥自己的才干，争取最好的成绩：在才智上、精神上、情感上，有了她，我的世界才成为完整的世界。

萨克文·伯科维奇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给予我人们只能期望在家里，在亲人身边才能得到的那种帮助。14年前，他使我的才智生活有了新的转机。为此，也为他曾在学术上给过我鼓励的无数其他时刻，我将对他永远感激不尽。

最后，我把我为《剑桥美国文学史》本卷所撰写的篇章献给我的祖母弗朗西斯卡·D. 达纳，她于1971年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25年后，在她92岁高龄时才成为美国公民。

赛勒斯·R. K. 帕特尔

大事记

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温迪·斯坦纳、亚当·韦斯曼，尤其是莫里斯·迪克斯坦和赛勒斯·帕特尔为文学大事记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做过一些可贵的更正。我对他们都很感谢。我特别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我在本书中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无不得益于他的睿智和耐心的教诲。最后，我要感谢伊丽莎白·米勒给予我的不懈支持和长久友谊。

乔纳森·福蒂斯丘

总序

这部多卷本的历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促进了一种英语写作新分支的引进。30年后,罗伯特·E. 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持编撰了《美国文学史》,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是一代美国文化研究者辛勤工作的结晶,他们为这个领域划定了新的疆界。这批学者和批评家主要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代表了美国文学作品的各个分支、新旧派别的广阔范围,他们已经开拓并仍在继续开拓的领域业已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过去30年间采用美国文化研究方式的文学批评已经从边缘区域扩展到人文研究的核心地带。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全世界,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学术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的辩论十分激烈。这些都反映出这个领域的勃勃生机。显然美国的文学作品已经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探索的中心。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以及通俗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已经渗透到该专业的各个角落。但也许这些研究最广大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关于多种文化主义和经典作品形成方面的争议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是跨越文化和历史的,但是各种争论常常转向美国文学作品。

在争论中,无论我们站在哪一方面,这些争论所产生的活动显然提供了一个焕发才智和启发新研究的源泉,重新发现了一大批被忽视或被贬低的作品。与以往相比,我们对有人使用的各种美国文学(复数形式)这一术语有了更多的了解,该术语的基础是美国多种传统、多种审美情趣甚至多种文学观点绵延不绝的特点。

这些发展无论从含义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扩展了美国文学的范畴。对于这一代批评家和学者而言,美国文学史不再是关于某一批大家异口同声称赞的美国杰作的历史,也不再是基于某种大家对美国文学作品一直采用的历史观。xiii 对于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追求继续下去,这也是理所应该的,但是现在这些方面的追求是在一种注重批评的分散性氛围中进行的,其中不乏学派之争,而最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从各自角度解释美国文学的不同学派之间开展了对话。



这种争论的现象标志着学术权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文学史发轫之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学史无不依赖对于其题材的本质或性质业已形成的一致性意见。而今天再诉诸这种一致意见就显得更像寻求妥协，更像怀念旧事。现在的美国文学史研究具有多重含义，它是一项集学术、批评和教育于一体的事业，有着众多声音和各个方面。在这种条件下，权威的功能是由一些虽有差异但又互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来发挥的。我们可称之为多样化权威。一方面，它存在于多样性的能量中：各种相互竞争的成份、物质体系和各派权威。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于批评家善于联系的能力中：他们把自己所用的方法的特点转变为挑战和参与的形式，从而使这种方法实际上以互补或对立的解释模式获得了实质和深度。

这部新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这两方面都堪称权威，既有争议又有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它代表了它所描绘的文化。我们的《美国文学史》是一部集百家言之作，是各种美国文学史的联合体——但这种多元论中又存在着差异，这是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中围绕着文化价值、信仰和思考方式等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的生动写照。书中部分陈述可圈可点，它们揭示出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技术创新与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部分却显然与此相反，有时甚至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论的批评（甚至是攻击）。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相反的观点正是本书最具传统性的一面。它采用了崇尚道德的态度——把文学分析作为提出反抗性以及非传统性观点的场合——这种态度是以浪漫主义对艺术的崇拜和上流社会对高雅文学的观点为基础的。这种观点坚持认为伟大著作中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所以这种观点有时以暗示的方式，对社会准则与习俗，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抨击，因而从理论和美学上促进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普遍的摒弃。其结果是人们对文学推崇备至，把它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超越法律准则的境地；借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说法，它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到20世纪中期，这种方法一方面产生了新批评派学者对工业化社会的攻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式艺术理论。新反对主义，包括反对正统文化的批评家，都是与这些遗产密不可分的。

是提倡还是批评，这二者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它所直接针对的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早期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问题太显而易见，因此不值一提，而我们最好还是搞清这个问题：在本书的各卷中，美国一词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或者日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疆土。虽然我们的作者之中有些人用比较的方式，在跨大西洋或者泛美的框架内进行



研究，虽然其中也有些人讨论了使用其他语言撰写的作品，虽然还有些人赞成后民族（甚至是后美国）的观点，但是一般来讲，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美国的英语文学作品——即人们通常在语言和国家含义上所理解的“美国文学”。

就我们而言，我们刻意选择了这种约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无疑反映了时间、空间、学识以及所能得到的材料的局限性；但必须指出，我们的撰稿人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已经竭尽所能。他们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学识以及可以得到的材料，把民族问题变成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们的关注集中在美国的英语文学上，美国这个词在他们看来既不是叙述前提——一种假定的、必然的或者自然的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即这个国家的历史）。恰恰相反，美国是多种多样对于文学史的探讨互相竞争的场所。它以中立领土的面目出现，欢迎所有公认的派别，而详察之下却是（并且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战区。

在本书各卷中，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即美利坚合众国。它是一个社会的宣言，其人民的组成与维系凭借的是语言上的授权：一套普遍的原则、一种凝聚社会的方略、一声号召人民反抗的呼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种美学理想、一种现代词藻（进步、机遇、新鲜事物）、一种包容性的符号学（大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以及一种排斥性的符号学，不仅把旧世界排除在外，而且排斥了南北美洲的其他国家，就连美国国内的一大部分人也受到排斥。一个如此产生的国家就是一个修辞上的战场。在本书各卷中，美国为探讨文本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的文本确切性提供了一个富于变化、涉及诸多方面的焦点。

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这是两个最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件事并非偶然。在文学研究中，人们从未如此深刻、如此透彻地从理论上对历史进行说明。把这个领域所有的特殊兴趣、把我们当代持异议的所有派别结合起来的就是对于历史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将历史看做种种观点、比喻和神话的基础与实质，看做我们阅读文本的内容和我们理解这些文本的精神，这样讲毫不夸张。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著作——一些艺术激情达到非凡高度的语言结构，已经超越了其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相信这些巨著的持久力量是一个不断地产生相反意见的源泉），经过思考，我们还是会发现美学上的超越之类概念本身就受到了时间的限制。正如其他种种自命客观的事物，从宗教信仰上对圣经的解释到科学上的客观性，美学上声称的高雅艺术也是由历史所塑造的。通过可辨别的历史意识，我们了解到其超越性的具体形式（天才灵感的美学、模棱两可的美学、颠覆破坏的美学、结果未定的美学等）。

xv



这种对于偶然性的认识同样扩展到历史著作中。有的历史比其他历史更为真实；一些历史在一段时间里被赋予了“权威性”和“全面”的盛名；但它们都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性时刻决定的描述而已。本书所写的历史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使局限性成为一种源泉，从中产生不作定论的探讨。以前所有的美国文学史不是总结概括就是包罗万象，不是以权威的气势讲述单一的观点就是使用大量简短的陈述，这种陈述同样像是在概括，即使是仅仅因为专家式的简略综合这一类型也早于作者声音的形成。而在这里则恰恰相反，本书通过大规模地叙述多种观点，为读者展开一幅美国文学史的画卷。由于撰稿人为数不多，每位作者都有机会详尽阐述独特的见解（前提、论点、分析）等等，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都是通过论证，而不是凭借断言来令人信服的；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化研究者所共有的主题、关切、焦虑和志向而与其他作家产生联系（尽管存在着种种差别）。

我们选择这些作者首先在于其学术上的卓越成绩，其次在于他们的著作对于批评界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作者共同展示了近30年来美国文化研究式文学批评的成就。他们为本书各卷所撰写的各个部分既表现出两代人之间的联系，也显示了其间的差异。他们讲述了如今被纳入美国文学之中、所含范围非常之广的材料。他们表达了种种特有的兴奋和承诺，使这一领域得以大为扩展。最后，他们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兴趣的多样性以及种族的多样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多样性在我们大学里已经成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特点。

xvi 这部《美国文学史》的组织原则有着同样的特点。其结构的灵活性旨在适应美国文学史的多样性。一些主要作家在许多卷中频频出现，因为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有些卷对一些原作进行了不同的描述，因为它们对于不同的文化经历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作者从各个角度反复讲述某一个运动的经过，因为这种经过需要多个焦点：例如既要与主流有关又要与边缘有关，或者既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种重复并不是作者刻意所为，但是从一开始重叠就受到鼓励，由此产生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别是与文学以及历史资料的丰富多样完全相符的。和以前文学史中所能找到的内容相比，这种重叠有利于更加详尽细致地对具体的情况（作家、作品以及各种运动）进行描述。

xvii

萨克文·伯科维奇